

随笔

## 迁居

吴明火

一生也迁居了多次,有居住仅一年的,也有居住长达三十多年的,仿佛人生就是在迁居中度过,孩子是在迁居中长大,市井众相是在迁居中领略和品味。

上个世纪六十年代中期,我从单位的集体宿舍迁居到一个叫林司后的老墙门里,租金一个月五元,陈旧的板壁房间,十来个平方,四五件家具,作了我的结婚新房。墙门里住着与我差不多房间大小的十多户人家,大家在逼仄的空间下,倒也相安无事,碰到了,点个头,笑一笑。尤其是我大女儿出生后,长得白白胖胖的很可爱,邻居们都叫她阿胖,见到了都喜欢逗她一下。周日,墙门里能拉拉唱唱的邻居会在公用的客堂间自动聚拢,唱唱《红灯记》、《沙家浜》这些京剧样板戏,悠扬的琴声和唱腔,常常引得路人注目,也有隔壁墙门的邻人进来凑热闹和捧场。在当时文化娱乐十分单调的日子里,也算是邻里的一种自娱自乐。

三年后,我迁居到旁边的池塘巷,私租户变成了公租户,房子面积也扩大了一倍。因为我已有了两个孩子,向房管部门跑了半年多的腿,总算分配给了我一个小套房。在那里邻居关系也和谐,有个叫“阿囡”的小姑娘很喜欢我的两个孩子,经常来串门,有时还帮着我们照管照管,像对待自己的亲妹妹一样,脸上总是笑咪咪的,细细的眼睛,清纯得没有一丝杂色。她的父亲不苟言笑,却很通情达理,她的母亲很善良,她们一家人对我们都很好。住了五年,我又迁居了,但常记得他们。

第三次迁居,是为了方便交通。师范毕业的妻子,因父亲冤案的牵连,被下放分配到崇贤教书,当时要从艮山门乘车至半山,再换乘到校。为了选择一个能就近乘车的居所,就与别人换房,迁居到艮山门附近的一条小巷拐角处,搬进去后才感到这地方环境脏乱,人际复杂,左右邻居排他性十分强烈,我们小心翼翼生活,对于一些霸道欺生行径,能避则避,能让则让,不予理会。一次我厨师出身的岳父来家,烧了一个大鱼头,香溢四邻,难得一见笑容的邻居,竟也放松了脸上肌肉,啧啧称赞这鱼头烧得好香。仅住了一年,我们就搬离了这个不想久留的地方,迁居到环城东路旁的一幢新起的楼房。

在那里,邻居都是从四面八方迁来的,没有原先的长住户或“老资格”,人员素质相对较好,讲道理,懂相处,相互彬彬有礼,也保持一定距离。有距离就有回旋余地,宽而不窄,润而不卡。最发闹的是隔壁的一个小男孩,天真活泼,夏天的晚上我把竹榻揩净,放在三面楼宇中间的空地上准备乘凉,小男孩却先我爬了上去躺在那里,秋天我家吃湖蟹时,小男孩就爬上我家餐桌边的凳子,指着湖蟹大钳,说要吃这个,我们笑着给他剥壳,看他吃得津津有味。他年轻的妈妈进来看到他这副样子,又笑又假装生气的样子数落他两句,大家都很开心。倏忽住了十年,我已人到中年,孩子也已上了高中,我又迁居到运河边,一住三十多年。三十年,说来话长,简而言之,五味杂陈。

本以为不再迁居了,可房屋老旧,人也八十初度,没有电梯的六层楼上上下下,有点吃不消了,就又兴师动众,下定决心来了一次大搬家。搬进了城北的一幢大厦里,既有三乘电梯,又有中央空调,客堂见明窗,小楼听春雨,近可闲逛楼下商场,远可眺望皋亭山影。

迁居,就是择栖,无论个人或群落一样渗透和交织着艰辛和欢欣,兵荒马乱的避祸迁居,天灾人患的求生迁居,陋室柴门的优化迁居,都得付出相当的精力和财力,在一定意义上说,迁居也是人生的一次洗礼,甚或是一次涅槃。迁居一次家什得损掉一次,生活得更更新一次,环境得适应一次,习惯得变换一次,感觉也会新鲜一次,人生也就历练了一次。

我想这是我最后一次迁居了,要说还有最后一次,那就是从人间迁往天堂。

行走

## 微醉安昌

张汶

大年初二,天晴气朗,一时兴起,携夫人从杭州家里出发,驱车50公里约一小时来到绍兴柯桥安昌古镇。原也只是耳有所闻,闲暇之行,也曾去过塘栖乌镇等,然一遭下来,安昌古镇带着根的原汁原味的绍兴民俗风情给我带来了深深的印象。

安昌古镇始建于北宋年间,镇上老街开市于明弘治二年(1489年)。现存三里长的依河古街市,传统特色的店铺作坊,错落有致的翻轩骑楼,粉墙黛瓦的台门民居,曲折幽深的石板弄堂,古老多姿的各式石桥,古朴迷人。

一进镇口,浓浓的乡风,浓浓的年味扑面而来。老街上张灯结彩,河面上乌篷船往来穿梭,游玩的人们熙熙攘攘。三里长的老街上店铺工坊林立。河岸上和店铺里挂满了酱鸡酱鸭酱肉,腊肠腊肉,腌猪头腌脚爪,腌青鱼腌白条,店铺里摆满了梨膏糖麦芽糖扯白糖,香糕冻米糕,霉干菜笋干菜,各种绍兴黄酒,女儿红加饭红花雕泰雕,各式酱油米醋如玫瑰米醋。老街上还有箍筒店,白铁店,毡帽店等手艺人坊。还有用糖和面现场制作的各种小人儿小动物,深得小孩子喜欢。

安昌历史上是浙东商业重镇,丝绸棉布制造和贸易集散地,老街上仍保留当年的织机和染坊,如今闻名的柯桥轻纺亦有其渊源。安昌还有一个穗康钱庄,清末鼎盛时在全国各地有26个分号。中国银行亦于1933年在安昌设办事处,旧址今尚在,足见当年安昌的繁荣。安昌历史还有深厚的文化传统。有一个叫“宣卷”的剧种和绍兴有名的莲花落并存的,清末民初时流行于杭嘉湖一带,后来

的杭剧就渊源于此。安昌还有一张闪亮的历史名片,绍兴师爷产地。原只知道绍兴出师爷,殊不知大多出于安昌。师爷盛于明清两代,他们是一种特殊人群。原是读书出身,因未博取功名或不安于功名,做了师爷。有两种,一种各级官府长官的师爷,实质是幕僚,帮着官府长官文书案头或是出谋划策,还有一种诉讼师爷,就是帮人打官司。安昌历史上曾出过许多有名的师爷,如今老街上专门开设了师爷民俗馆。师爷既是一个职业和身份,亦隐隐地含着当地人的性格特点风俗传统。

午后的阳光下河水泛着粼光,乌篷船穿梭来往,我静静地坐在廊街下,喝着茶,品着茴香豆,青豆的回味。老街上熙熙攘攘的游客已渐渐散去,忙碌了一天的店老板也靠在排门上伸个懒腰,喝口茶,歇口气。喝着茶,望着老街上情景,似曾相识。

这不正是半个世纪前杭州老城中河边河坊街的景象再现吗!

有句老话,萧山萝卜绍兴种,老杭州何尝不是。你去仔细查查,当年老底子杭州人中有两拨外来人居多,一是做生意的徽商,我的先祖就是从安徽宁国而来。一个就是做各种手工艺的绍兴人。儿时四周绍兴话不绝于耳。因此绍兴杭州两地建筑,风俗,亦有许多相似之处,感觉回到了儿时的杭州,一水一桥一房一弄仿佛就是曾经儿时印象中河坊街的再现。

太阳西下,华灯初上之际,千百只形态各异的灯笼齐放,构成了河两岸老街上美丽的夜景。寻一家酒店,点几样土菜,打半斤元红,我微醉于安昌。

评弹

## 嬉皮其表正经其里

马巧红

刘诚龙好写杂文,又一本23万字的《民国风流》出炉。

本书开篇是《那些去留学的大师们》。华罗庚26岁去英国剑桥大学之前,他已经在清华大学当讲师,不过他的文凭是拿不出手的初中毕业证。学校看他文凭低,“被公派去了剑桥,但是,华罗庚却没有珍惜这个拿文凭的绝好机会”,他引用华罗庚的一段话是“因为读博士只能读一门功课,而做访问者哪门课程都可以上。我来剑桥,不是为了得学位,而是为了得学问的。”还有北大校长蔡元培,在国外也是喝了好几年的洋墨水,但是,他没拿硬通货回来,“吾人到这里,是来学文化的,不是来拿文凭的。”一篇短文中,民国那些去留学的大师们,胡适、梁宗岱、陈寅恪、鲁迅都被点了名。

《当年武大没教授》《校长握过你的手吗》《民国教授打分数》,一篇接一篇地往下读,真的不想歇气。

苏雪林从安徽大学到武汉大学,由教授降格为讲师,不是苏学林水平低,这里体现的是“民国道理”:民国惜公器,教授是一个崇高称呼,不是市场小菜,也不是专卖店的帽子,不是略有点才气,略有点学识,就可以批发的。“世界上许多东西往往是这样的:多了,也就滥了;滥了,也就贱了,其反命题是:少了,也就贵了;贵了,也就尊了。当人人都可以叫做大师的时候,把大师当瘪三来看,也就是顺理成章的了。”看似玩世的语气,却有警世的大义。北大校长司徒雷登不与权贵点头,却与学子握手,新学生入校,他“站在其居所外之松墙边,准备请茶,

准备糕点,笑容可掬地招呼大家,与到访的学生一一握手,嘘寒问暖,道辛苦,打恭送祝福。”行文至此,刘诚龙转头问问尚在读大学的女儿有无与校长握过手,他女儿的问答干脆利落,爸爸,你没见过世面吧,“校长的手只跟领导去握了”,怎么会跟我们来握?作者因此感叹:“司徒雷登不忙吗?估计比当今的大学校长更忙吧!”忙,谁不忙呢?“手能不能向学生伸过来,取决于心会不会向学生投过来吧!”

《民国教授打分数》挺有意思的,林语堂用相面打分;黄侃给全班学生打分“大半打八十,小半打七十”;顾颉刚打分搞开卷,“顾教授评分有规矩:抄我观点者,替人家背书者,低分(似我者死);自有观点者,或驳我观点能自圆其说者,高分(学我者活)”,作家由此发论说:“比较来比较去,我还是喜欢去顾颉刚门下当学生,别的不说,单说其考试,就是最好的:考试也标准,无标准答案。”轻轻一语,重击我心,想笑笑不起来,作家的话外音,震了我们五脏六腑啊。

大家都说刘诚龙是嬉皮士,他文章确实是行文不正经的。但他其实是个非常严肃的作家,他选材或是边角余料,小故细节,他立意却是微言大义,高视阔论,风花雪月他不想谈,鸡毛蒜皮不屑论,所谈所论者,世道人心事,国泰民安事,兴衰存亡事,政经学术事,通古达今事,反腐倡廉事——选材或细焉,发论也大焉,为人或低焉,立论也高焉。有人说过,刘诚龙文章是糖衣炮弹,糖衣是吸引我们读者来读,炮弹是叫我们读者跟着他去,炮打人间丑恶,尘世龌龊。